

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带来的机会和风险

(加拿大)S·J·纽莫夫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个决策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以往的三十多年来(即从1949年10月1日全国解放以后)从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建设工作。中国在1949年这场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改变社会,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作了相应的调整。虽然中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并无异议。但对如何具体划分阶段则意见很不一致。因为解放三十年来,每个阶段都有激烈的政治运动,有人就建议用这些政治运动来作为区分阶段的标志。虽然国内外人士对这种分阶段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都是把在每个阶段中发生的事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或有害作为评价这个阶段的标志。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解放后,中国革命的进展总是沿着两个极端在摇摆,要么发生极右,要么发生极左,这叫钟摆理论,也就是左右摇摆。但是依我的看法,把革命阶段按发生在该阶段中的政治运动,或在运动中发生的重大的极左或极右的决策来区分是不妥当的。因为根据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也就是列宁主义的论述,社会或革命的进展是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将一个个阶段划分出来的。革命应看成螺旋形的进程。中国解放后每个阶段制定的政策都是在内外因素或压力下形成的。这个压力中有来自美国或苏联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当局作出了决策。国内外人士往往忽略了这种决策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不再适应于下一阶段了。每一个阶段的决策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政策需要一段时间才慢慢趋于成熟,然后才能加以总结。总结以后又应该往前看下一阶段应作出什么新的决策来适应新的阶段。因此,一时的政策都只能适应当时的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发生的正面或反面的政治运动都是出于当时发展的策略的需要。这一点往往不被所有的人理解。新情况需要制定新的政策来适应。由于人们的认识不足或官僚主义惰性或害怕新的变革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出现有人对新变动的抵触情绪,他们采取消极态度。有些人甚至抵制新的政策,使其难以贯彻。有些人安于现状,认为现有政策已很完善,不必再改进。当前我们提出要实事求是,要根据客观情况制定新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要从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历史观点来观察每个时期的决策。从1966年——1976年发生的重大的偏差和失策也不能排除在这个规律之外。如果把整风的含意扩大,则1977年所做的是一个大整风。政治上的口号越来越明显地用来代替真正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要从事真正的经济建设,仅仅有政治思想意识上的工作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工作毕竟不能真正代替经济建设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矛盾,本应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东德、捷克的生产力比较发达,在它们那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导致矛盾的结果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理由是复杂和多方面的,这本是一个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经常讨论和关心的话题。我的看法是资

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制度，它超越了现存的国界，而变成了全球性的制度。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它的危机和剥削转嫁到它最薄弱的环节，最落后的地区，比如第三世界。沙俄在1916年发生革命是因为那时俄国是欧洲发达国家的边缘，也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于是那些地区就爆发革命。这种地区的革命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革命，一是民主解放运动。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地区爆发的革命，它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因为在这些地区存在了一种变态的、混合的生产模式，即半封建主义、半殖民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则极端的低落。在这些社会中，政治落后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政治又都落后于它们本身的经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的经验是搞了两个阶段的革命，中国是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是苏联的两个阶段论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论或其它一些国家所提出的一些独自的革命形态都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社会结构上的弱点，即落后的生产力。在这些国家里新兴的无产阶级尽管有能力建立政权，从而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但同时却面临一个严峻的任务，这就是马克思历来主张的应该依靠资本主义方式来完成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则苏联的两个阶段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论或其它在各种革命中发展的意识形态都应该看成为过渡的过渡。虽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说成它们之间有着机械式的固定关系，但一般来讲，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应该看到，无论在苏联、中国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为发展生产力的过渡的过渡阶段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收益之不平等性。而这些不均匀、不平等是产生在非剥削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制度是想把不平等和剥削永久化，而在新民主主义或其它的过渡的过渡阶段里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尽量想创造条件来消灭剥削，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个过渡的过渡阶段可以缩短，但不能超越，尽管有时由于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这时必须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内进行革命。但有一个基本点则是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只能依靠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实现这个目的。不管为了发展生产力，是通过上层建筑或其它方式来进行，但目的是一致的，即要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我们应该记住，社会主义应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平均的贫穷的制度。

中国在1978年是站在十字路口上，需要对以往三十多年的社会革命和改造作一次有批判性的总结。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物质生产上的发展速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中国的资源、人力来讲没有充分发挥潜力，比起发达国家技术上的进步，中国更是落后。为了现有资源的现代化，也就是最充分地发展生产力，中国需要一个技术上的革命。中国人面前有两个选择：继续保持革命的自给自足或者对外开放？如果选择前者，实际上就等于宣布中国革命打算仍跟着别人后面走，这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这个选择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选择“对外开放”的出路，则要接受现实中的两种情况。一是中国与其它国家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开放时与其它国家也是处于这种不平等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使中国在与其它国家打交道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剥削。另一情况，如果中国因此就不开放，不与其它国家交往，中国仍保持落后经济，则这种落后也是一种被剥削的状态。应该选择那条路，答案看来是明显的。我们应该选择对外开放，但这并不是说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中有的性质相当严重。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下面我把中国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希望中国开放的目的列一张表进行比较。表内只包括要点，而不能包罗万象：

中国开放有8个主要目的：

1. 通过两种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一是直接向有技术的国家购买，并通过对外贸易顺差

自筹资金；二是与外资合作搞合资企业，外方作设备投资，中国不必为引进先进技术而付外汇。

2. 增加生产，使社会有更多可支配的生产产品。

3. 增加现代化工农业部门，改变人口结构，使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这也就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建议。

4. 取得生产和经营的经验和本领。

5. 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技术经济中心，通过它们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生扩散作用，这也就是“以点带面”的方法。

6. 提高就业率，使中国的待业人数减少，就业人数增加。

7. 逐步提高自己的技术力量以发展民族工业，本土工业，创造出自己足够的产品以逐步取代进口产品。

8. 开放必然带来社会问题，但要把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衡、脱节等消极因素压低到最小的程度。

总而言之，开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些先决条件来消灭外国与中国的不平等，中国内部地区与地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对待中国开放政策上的目的是：

1. 最大限度地提取利润。

2. 把中国拉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实行全球性的劳动分工，使中国在这个基本体系中起到辅助的作用，取得一定的好处。

3. 使中国在出口市场上得到一些好处，使中国愿意维持这种基本体制，不致于影响到本身的利害。

4. 培养一批中国官员，使这些人的观点变得以贸易利益高于全国的战略。

5. 在中国鼓吹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混为一体，他们用鼓吹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以证明资本主义体制能将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人们带来更大富裕。

6. 其政治目的是要使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采取中立态度，以此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

资本主义体系现今的某些特点：在一些主要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资本在海外的投资有很大的重要性。以下是第三世界接受私人直接投资的百分比。美国私人投资有14%在第三世界；英国有10%；德国和法国各有30%；日本有60%。根据以上数据，短期对双方都可以有利，即做到互利，但长期能不能做到互利则是个疑问，而且短期内互利中也存在矛盾。根据其它第三世界的经验，这种矛盾的性质还是相当严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掀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明了一些剥削落后国家的新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剥削方法是通过直接占领、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当前又进了一步，通过对技术、资本、知识密集的控制来剥削落后国家。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将这种方式变成一把锋利的刀了。这个问题的意义从利润与投资间的比例可以反映出来。1950年——1977年，美国向外直接投资总额263600万美元，同时得到利润795800万美元。对第三世界投资的回收率：由1971年—1973年，从14.1%增长至27.2%，大大高于资本家在本国投资于制造业所得的回收率。除此之外，美国对第三世界销售的商品比对欧洲、日本的总额要多。至1980年九家美国最大银行没有了结的贷款，其中40%是贷给

第三世界国家的。我刚才讲了开放政策是互利的，如果允许我们选择，我们要作这个选择。但应该记住，在很多领域内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在第三世界，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发展出口带动生产的增长，尽管这个战略好象很有吸引力，但仔细分析则发现它并不是对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都是有利的。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七点消极因素：

1. 通过大力发展出口带动生产的增长会产生“二元”经济，即一部分工业很发达、很先进，另一部分传统工业却仍很落后，造成两者之间的不均匀。

2. 如果从成本与效益来看，外国进口来的机器、设备参加本国投资，但出口所创的外汇并没有抵偿在以出口带动生产中投入的资本。例如，南美的哥伦比亚发现他们通过出口赚得的外汇仅占进口所用外汇的33.3%。非洲的苏丹为了进口农业、化工原料来改进棉花生产，但生产的棉花，出口后赚得的外汇却无法弥补其投资，亏空了1600万美元。

3. 养成新的对外的依赖性，如果更多的依靠出口来赚外汇，来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动力，我们就会越来越多地依赖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在进口技术方面不得不接受一些“一揽事合同”（即不必要的合同，为我们不需要的部分），我们还会习惯并束缚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套在对方的零件、后勤支援（即售后服务）中。那些有综合能力的联合企业，他们有时在提供生产流程的第一阶段时表现得很慷慨、大方，为什么？因为第三世界要了第一阶段，以后必然会要第二、三阶段。他们只要能控制以后的阶段，则就可以控制对方的发展。

4. 本国的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可能会被歪曲。以南朝鲜为例，原来它是个粮食出口国，后来因为对外开放，本国经济受跨国公司影响，现在变成了粮食进口国。第二例，是马来西亚，该国从1970年初期到末期，为了鼓励出口，在出口行业中的投资由33%增至54%，这样，对国内国民经济的投资就减少了。

5. 在对外开放中要当心发生贪污行为。外国投资者急于求成，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低，于是外商们就向政府官员行贿。一个西方国家驻某一发展中国家的推销员，他赞助了这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贸易代表团出国访问，由他负责旅费、吃饭、住宿，还要提供娱乐和零花钱。这个西方办事员现已在另一发展中国家设立了办事处，他想要干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6. 会在社会中造成一部分人变成既得利益者，这批人只是鼓励贸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向钱看”。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管国家全面的经济发展策略，他们将由既得利益者发展为一个新的买办阶级。

7. 外国资本家把一批外汇发放到中国市场，促使他们进行无用的消费和养成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当然，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特别在质量、成本、预算控制方面尤佳。当然要注意这一切优点是紧密与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一定要清楚，企业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方式，是组织工作、组织生活、组织权威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目的是实现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或体系）。几年前，我对分布在国内外66个美国式的企业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它们的管理技术和方式的比较发现，美国的经理们最得意的是他们的自动管理方法及他们的高层集权。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是尽量传播、鼓吹他们的方式，即最大的获取利润，为使私人谋取最大的好处，而不是照顾社会的全面利益。美国企业在第三世界鼓吹的方式，用的手法就是在这些国家形成一批劳工贵族，用这批人来为拥护这个体系而卖力。美国老板还向工人鼓吹政治是无关重要的，经济实惠最重要。如果你们对资本主义

的成本会计缺乏经验的话，那么，在合资企业中大部分利润将会溜掉的。因为他们的计算方式可以在利润分成前把一大部分利润提取出来。跨国公司最通用的方法是：使用调拨价格法来实现他们提取利润的目的。我发现，现在的合资产品的定价有35个名目(或因素)是这些跨国公司用来隐瞒利润的。尽管第三世界政府已作了种种限制，但也无法限制这些外国资本家们从中渔利。例如，南美的哥伦比亚向汽车工业扩资，但后来发现汽车工业的净利润只有2%，但克莱斯勒公司按净固定资产的方法计算利润，从1971—1979年之间，该公司的年平均利润是71%，而不是2%，还有很多同样例子说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交易的这种不平等，实质上就是剥削。当然，也有一些积极因素在内，好处是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交往可以扩大税收；增加制成品的出口百分比；增加生产力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如我们墨西哥的外资企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与本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一对比，前者比后者提高60%，二者的生产率则差2倍，但是，如从机会成本这个角度来考虑，如我们把本地资源、人力都集中在搞出口工业抑或是用来发展本国的国民经济，这种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会告诉人们依赖发展出口工业不一定是合算的。象牙海岸的经验向人们展示外国资本卷入当地经济，对就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当地积累没有多大价值，对资本部门和中间部门都没有推动。

中国比任何第三世界的国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应该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得到好处。可以看到中国这几年来年的发展情况，从1979——1983年，工人的平均收入提高7.4%；农民平均收入提高18.3%；城市失业率由5.5%降至2.3%。这个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证明即中国的开放经济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从1978—1983年中，轻工业年增长率增加11.3%；重工业年增长率增加了5.1%。这种增长充分说明了开放经济战略是正确的。这个发展战略应当坚持下去。不然，在中国的“大锅饭”将变成“小锅饭”、“铁饭碗”将变成“土饭碗”。中国人民如要对世界历史作出应有的贡献，则这个碗就应该深一些，锅应该大一些。中国的决策人应该注意到在使国家得到繁荣时，一些地区不要太过于繁荣，另一些地区也不要太过于落后。从1979年到1983年外国在中国的总投资共145亿美元，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构成威胁。现在中国有的企业想到海外搞投资，他们既忽略了机会成本(没有对这些投资放在国内后能取得的收益进行比较)，又忽略了这种投资所牵连到的社会政治含意。例如，在国外投资的合资企业里，如外国工人进行合法罢工，中方该持什么态度。

中国近期的目的是要改变生产力，以便允许生产关系能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发展。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会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色相类似。这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追求一种政策，企图歪曲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资本主义世界把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看作为社会特点，永不可改变，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对此挑战的回答，不仅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对整个第三世界也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也面临了与中国同样的问题。

应优先研究的几点建议：

1. 对市、县、省及国家一级的与跨国公司已签订的合同进行一次全面分析。广东省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在最前面，广东省应该在这方面起个带头作用，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些已签合同的相似性及不同性。这种审查还要加上一点批判性的分析。分析正面与反面的经验。找出中国方面优点与弱点，编制一本“范例手册”以帮助将来各级涉外单位与人提高他们的责任和谈判能力。

2. 检查经济特区和其它企业从外商那里得到的技术管理和工作技能是否传递到内地，

或有关部门的企业里去了。其目的是要解决为什么过去这些技术没有转移到内地企业去，从而加快这个转移过程。

3. 中方应对如何确定在合资企业中所占股份价值的计算方式作出评价。另一方面也要研究的是中方是否应对外商确定资产净值的计算方式作一定限制，其目的是不让他们为所欲为地进行计算，例如中国是否允许技术服务和专利作为外商所提供的产权资本的一部分。

4. 对中国国内的经济特区间的互相竞争进行分析，以防止由于竞争给外国投资者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从而抵消自己的力量。厦门与深圳特区之间的竞争就是一例。

5. 检查是否有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作为外国公司提供的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又重新输入中国。这种情况在广东省已见到过好多次。

6. 向外商进行一次调查，关于他们在中国做生意所遇到的难题。为了得到真实情况，调查时最好不要他们签名。

对进一步调研的初步建议：

1. 完善责任制，包括综合奖金的方式。这种方式应包括个人生产单位和社会生产单位。奖金的计算应根据相应的比例，包括个人、小组(队)、车间、层次、班次及整个企业。

2. 应当有计划地引进抵档、中档、高档不同等级的技术，各个档次的技术有各自的引进目的和相互的比例，这些目的包括：

(A) 技术引进与转让；

(B) 创汇能力；

(C) 尽量减少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D) 拟订一个培训计划，使技术工人由低级到中级，由中级到高级，一步步提高；

(E) 在二十年内应当有步骤地分阶段地采用建立技术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办法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这类基金来自于占全部外汇收入的1—3%的固定税。所有先进技术项目应隶属于研究与开发小组。

3. 中国驻外使馆商务处应当加强，以便有能力提供有关有竞争力的技术信息和提供用户有关合资经营与补偿贸易产品价格结构的信息。

4. 应成立一个科技情报研究所，该所的信息中心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报数据库相连，以便得到要检索的技术情报。

5. 合资企业的合同应包括这样一项条款，即能使中方取得在产品销售和产品包装两方面的国外的直接经验。

6. 设立一个中央登记处负责所有与外商签订合同者的登记注册工作。地方的决策应当予以尊重的同时，合同或协议的文本应提交到中央进行评价，以便进行总结，改进今后工作的水平。

7. 重大项目建议委员会(如武汉钢铁厂)不应当在项目一完成就解散了，这样，在建设过程中委员会成员所吸取到的经验就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将来委员会的核心小组应当保留下来，使他们从很复杂的建议项目里吸收到的经验能够得到推广。将来遇到同样复杂水平的建议项目时，这些人便可以把他们的经验贡献出来。

8. 所有先进技术的项目应包括一条对中方的补偿条款。如果中国对引进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作了改进，而外国制造商一旦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则应给中方一定的补偿。

9. 应建立一个技术评价服务中心使程序标准化，以确定：

a、设备在技术上或数量上是否达到标准；

- b、设备是否在国外已定型还是卖到中国来做试验；
- c、引进的技术是否达到了世界水平或者很快就会过时；
- d、恰当地估计被批准的合伙人或投资者的可靠程度；
- e、技术规范是否够详细或辅助性的资料是否已具备。

10. 在签订补偿贸易协议支付条款时必须保证商品价格变化的周期与人民币兑换率变化的周期要一致。

11. 在计算支付时中方应使用一个综合公式，它包括固定部分与可变部分。这是用来保证在世界市场波动的某种范围内的最小稳定性。

12. 应订出会计人员培训计划，尽量多培训人员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成本会计，计算方法，这样使中方有足够的会计人员能够监测合资企业的帐目，不至使一些利润无缘无故地外流，特别要注意跨国公司会通过调拨价格来把他们不应得的利润偷走。

13. 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经常用招标的方式使外国投资者或合伙人得到合同，但是这种竞争性的招标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标要使招标者取得合同在某些情况下就不一定适用，特别是对某些高尖技术合同，因为很多高尖技术的行业都已经完全垄断了或者是半垄断化了。垄断了的这种高级技术在各地都有它的分公司，参加投标都是他们自己人，投标往往是假的。

14. 当谈判讨论加工费时，应当分析到各行各业的加工费是有所不同的，以保证中方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

15. 在经济特区及外国代办处工作的中方职员或工人很快从外国资本家那里知道资本家付给他们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当局应及时向工人或职员说明白，由于在中国有一系列的福利制度而在外国是没有的。在国外，这些福利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工人或职员了。这样可以缓和工人的不满情绪或避免因此所引起的矛盾。

16. 应当建立技术发明和技术更新的计算机处理和储存文件的中心，以防止重复引进。

17. 要求提供技术的所有外商在谈判提供技术的同时，也包括如何提供资金的条款在内。

18. 很多外国政府鼓励他们的商人在中国进行市场调整或产品推销或宣传来促进贸易。然后外商就向他们的政府拿钱说我在中国市场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外商不说清楚，他们在中国企业或单位也一样收钱，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两次付钱的现象，这是应该避免的。

19. 作为技术转让的一部分，要求供应商提供在该工业内的技术发明。

20. 应谨慎地审查一下与可行性研究有关的费用。这种费用是比较难确定的。还有，在可行性研究计划中应包括一点即培训中方人员自己能独立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分析的能力，避免将来中方老是要依赖外方进行可行性研究。